

## 紳士般備受尊崇的專業

### 從五名陸官學生開除事件談軍事專業與軍人榮譽

陳文政

#### 提要

本事件涉及軍隊的自我認知與社會認知的問題。一方面，軍隊對未來軍官的期待，就是軍隊整體自我認知的投射與反省。另一方面，當大部分的民間聲音贊成陸軍官校的開除處份，也是社會對於國軍軍官整體的認知投射與責任要求。本文由軍事專業的角度，討論「為何軍官需要有較高的榮譽感」及「榮譽的內涵為何」二項議題，並述及在當今社會變遷中，前二項議題的轉變。本文認為：

一、從我國軍隊裡軍事專業的形成並沒有存在真正的歐陸貴族軍官體系，以身份特質投射到具有較高的道德標準的說法，在我國是不具說服力的。對於軍人作為志業的強調，將是未來維繫軍人道德標準高地的最重要基礎。

二、我國軍事專業中務實型武裝公僕的色彩，使得軍人榮譽在志業層次上與理想不可分、在專業層次上與責任不可分、在職業層次上與守法不可分。

三、最後，對於一個相對上較為傳統與保守的軍事體制在自由與多元的民主社會中運作，一個均衡的辦法是杭廷頓所講的：「軍事建制儘管不同於但卻不疏遠於它所服務的社會。」

關鍵詞：軍事專業、軍人道德、軍隊與社會

#### 一、對開除五名陸官學生事件的幾個思考面向

五月底，陸軍官校先以退學、繼而開除處分五位集體考試作弊的應屆官校畢業生。而另一方面，這五位遭到開除處分的學生，也先後向立法委員、媒體與社會團體求助，希望校方能網開一面。相關新聞喧騰了幾天。然而，在校方堅持立場而社會大眾也未認同學生訴(16)求的情形下，事件在這些學生黯然認錯並接受開除的事實後結束。

事件的新聞熱點在於：國軍軍官如何看待這幾位官校生作弊與表達訴求的行為。就作弊而言，若干民間人士認為：考試作弊固然有錯，但校方站在教育的立場，實可給予這五名學生再一次機會。而校方認為：軍校學生榮譽制度就像上戰場踩地雷「只有一次機會」。就表達訴求而言，民眾自認受到委屈，找立委陳情或向外界公開取得認同與奧援，所在多有。而校方則認為：這些學生用激情的手

段，將自己的錯誤與邪惡合理化，將自己塑造成悲劇英雄。<sup>1</sup>

但拋開作為新聞觀眾的窺視角度，此一事件觸及到兩個層面的議題：在表面上是軍事教育（特別是軍官養成教育）的成效問題。誠如湯部長六月六日在「精進國軍軍事教育研討會」中所指出：雖然大部份輿論支持陸軍官校對這五個學生所做的處分，但這也使得軍事學校一向最引以自豪的人格與軍官養成教育，受到無情的打擊與莫大的傷害。<sup>2</sup>當軍校高年級生（其中一名甚至是學生標竿的實習旅長）考試作弊，就算沒有事後鬧得滿城風雨，已然是軍校教育的失敗。就此一層面，軍事教育體系當然有若干值得加強改進之處。

不過，軍官養成與人格教育不單單僅止於於軍事院校體系。畢業的少尉軍官會進入基層部隊，逐步展開其事業，在過程中，他會與資深或資淺的同僚產生互動，會與所指揮的士官兵產生互動，會與所服務的社會與政府產生互動。在過程中，他不但被影響也影響別人對於「怎樣才是軍官」與「軍官的榮譽是什麼」的看法。這使得吾人必須進一步思考第二個層面的問題。這一層面的議題涉及到軍官的自我認知（self perception）與社會認知（social perception）。前面提過：在民間，考試作弊可以被原諒，向社會大眾提出訴求可以被同情，為何軍校學生就必須要有不同的高標準？很明顯地，軍人自己以及社會大多數人都認為：作為軍人的應有表現應當與一般人有所不同。

因之，如果說文武大學學生是未來棟樑的話，那麼就前者自我認知的部份，軍隊對自己的未來軍官的期待顯然要高過於對民間的大學畢業生。軍隊對未來軍官的期待（「他應當是怎麼樣」的問題），直說起來就是軍隊整體自我認知（「我是怎樣」的問題）的投射與反省。當軍校、軍官團乃至軍隊整體告訴社會「這些學生怎樣不配成為軍官」（區分「他者」（other）的問題）的同時，也在界定「自己怎樣才是夠格的軍官」（劃出「自我」（self）的問題）。同樣地，就後者社會認知的部份，大部分民間的意見對於未來軍官的期待顯然也是要高過於對一般大學畢業生。社會不認同（17）這五位學生的訴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會對於軍隊整體的認知投射與責任要求。當大部分的民間聲音贊成軍校的開除決定，同一標準與要求也將適用到軍隊其他軍官身上。

所以，在事件的深層，是軍官的自我認知與社會認知的問題，是國軍軍官們如何看待自己與當今國內社會如何看待國軍軍官的問題。本文所探討的乃是由西方對軍事專業（military profession）的論述概括地討論此一層面中的二個議題，即：「在軍官自己的認知與社會的認知中，為何軍官需要較高的榮譽感」以及「在軍官自己的認知與社會的認知中，榮譽的內涵為何」。同時，誠如下文所要詳述的，這些認知雖然有很大部分承襲自歷史文化背景，但它並非固態地一成不變，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下，這些認知會有不同的強調或甚至轉變。因此，本文的另一個焦點在：在當今社會變遷中，軍隊應當如何與社會互動，特別是針對前述「為何軍官需要較高的榮譽感」以及「榮譽的內涵為何」兩項議題，軍官自我

<sup>1</sup> 中國時報，民國九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版一；聯合報，九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版一一；中央日報，民國九二年五月三十日，版一三；台灣日報，民國九二年五月三十日，版五。

<sup>2</sup> 民眾日報，民國九二年六月六日，版二。

認知與社會認知是不是有所轉變。由所討論的這幾項議題觀之，本文意旨不在於爭論對這五名陸官學生開除處份的是非，而是透過此一事件背後規範性基礎的瞭解，企圖對於未來國軍軍官的養成帶來些許啟示。

不過，在正文之前，讀者必須留意到的：目前西方軍事專業的相關論述，多以歐陸時空下的軍隊為主。但東、西方有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一百年前大清帝國與大英帝國兩國軍官的最大差異，或許不在他們所配備的武器，而是他們所淵源的社會背景與被期待的政治功能。<sup>3</sup>這些差異，往往影響甚大：神風特攻隊對日本軍人而言是以身殉國的武士道最高榮譽表現，但在西方人的戰史裡，依照西方人的標準，卻可能被認定為是野蠻的行為；而東、西方軍隊對於在哪種情況下投降才不致辱及軍官的榮譽，也經常有南轅北轍的見解。因此，若把西方軍事專業論述當作為普世皆準的標準，用以討論我國軍事專業上若干議題，將不免有失真之憾。因此，為補強計，在本文中，作者將佐以湯部長在六月十二日莒光日對此議題的一篇結構嚴謹的談話作為參照。

## 二、為什麼軍官要有較高的榮譽感

對此問題的答案，具體地反映在湯部長六月十二日莒光日教學節目的談話，湯部長以「西點的道德標準要比美國的國家標準更高一層」再次強調軍人至高無上的榮譽冠冕，在「優良傳統」與「信念」方面，「是有別於社會上其他民間團體的」。為什麼國軍要有不同的、高標準的榮譽感？湯部長指出兩項原因。第一是黃埔精神，在於「先烈先賢以身殉國，寫下壯烈詩篇，……雖死猶生，足為萬世所效法」。第二是因為軍人任務特性使然：「一般人在日常行為犯了錯誤，可能只是造成個人名譽、財產的損失，或是陷於法律的爭訟」，但「軍人以保國衛民為職志，在面對生命的威脅與其冒險方面，遠高於其他各行各業。」戰鬥的風險使得軍人可能面(18)臨苟全或成仁的抉擇，「一旦犯錯，就可能危及整個團隊、同胞的生命，乃至國家的安全」。<sup>4</sup>

在歐陸，以榮譽為核心的道德標準則與軍官個人特質以及軍官對其工作的承諾間產生很深的鍊結，<sup>5</sup>而此鍊結歷經幾千年的演進，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強調。

就軍官個人特質方面，在歐陸軍事專業的形成與演進中似乎呈現以下的模式，即：具有較高榮譽觀念者足堪作為軍官，而哪些人具有較高的榮譽感則由天賦的出身決定轉變為由後天的教育與訓練決定。

<sup>3</sup> 誠如霍華爵士所謂：「形塑軍隊的不單單是他們所配備的武器，同時也來自於軍官所淵源的社會背景與意欲的政治功能。」見：Michael Howard, *The Franco-Prussian War: The German Invasion of France, 1870-1871* (London: Routledge, 1961, reprinted 2000), p.8.

<sup>4</sup> 湯部長講話內容見國防部網站：<http://www.mnd.gov.tw/modnews/mininews/news.html> 本文以下所引出處，亦同。

<sup>5</sup> 例如簡諾維茲 (Morris Janowitz) 教授認為：「榮譽被認為維繫整個軍事專業，被認為能確保軍官的特質以及保證其職業上的承諾。」見：Morris Janowitz, *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A Social and Political Portrait* (New York: Free Press, 1960, reprinted 1970), p.216.

具有較高榮譽感者足堪作為軍官的說法，在歐陸大抵未遭遇到太大的質疑。<sup>6</sup>然此一基於「服從」(deference)原則下的說法最初能在歐陸被視為當然的原因，與其是說服從者理性判斷的結果，倒不如說出自於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下的階級概念。<sup>7</sup>至於哪些人被認為具有較高的榮譽與道德，有一番較為曲折的演進。

自然地，歐陸早期軍隊的組成反映出當時的社會階級意識。<sup>8</sup>在十九世紀軍事專業主義抬頭之前，軍官與貴族大抵是同義的。軍官多由貴族（或偶爾由僱傭兵）擔任，這些人並不把擔任軍官當作是個專業。對於貴族而言，軍官是項嗜好，他們追求榮譽與探險，他們之所以成為軍官與其說是出於才幹，倒不如說是因為其血緣出身。他們不太需要教育來「養成」，因為他們的身世，他們天生就有勇敢與榮譽（19）的特質。<sup>9</sup>例如：在荷馬的《依里亞得》(Iliad)中，希臘時期的交戰雙方軍隊都由世襲的貴族所組成，他們為追求個人榮譽而戰鬥，戰爭成因也因此很大部份是與個人有關，例如為了爭奪代表榮譽的名女人海倫(Helen)。「《依里亞得》中的軍事行動反映出一種層級森嚴的世界觀，……書中沒有一個主要人物死於低下階級的手中。因是，戰爭是重要人物間的事，常常個人化成為兩個有相同社會地位的戰士間極具風格的決鬥。」在這種戰鬥中，對手的出身背景越高跟他搏鬥所能獲得的榮譽就越高，而反之亦然，因此在這種英雄式戰爭型態中，兩造通常會在戰前先辨識彼此的身份地位。<sup>10</sup>

但是，由於科技條件與政治背景的轉變，連帶引起戰爭型態的改變，<sup>11</sup>在十九世紀前後，以往諸侯或城邦內由貴族所組成的小規模軍隊，逐漸演化成主權國家裡自平民大量徵集而來所組成的常備軍隊。貴族在軍隊中的地位日漸削弱，不

<sup>6</sup> 軍事失敗與醜聞偶爾會影響這項說法。例如：第一次大戰後，在經歷過數次類似索穆河 (the Somme) 戰役的傷亡慘重經驗後，英國人普遍對其高階軍官失去信心，英軍指揮官海格 (Douglas Haig) 成為眾矢之的。德國人也稱「英國人打仗像獅子一般，但卻被一群驢子所指揮。」可參見：Alan Clark, *The Donkeys* (London Pimlico, 1991)。同樣地，越戰使得美國軍人的社會形象受到損害。見：Janowitz, *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p.xl.

<sup>7</sup> 此一服從精神在於上帝或自然注定一種社會或經濟的層級，有的人比較高，有的人比較低。那些比較高的人有領導與指揮的責任，而那些比較低的人有義務服從並滿足於其現狀，為了整體社會的利益繫乎於對此層級社會結構的尊重，如果沒有這種有秩序的層級，那麼無政府、破壞或無以名之的邪惡事物將會出現。見：Christopher McKee, *A Gentlemanly and Honorable Profession: The Creation of the US Navy Officer Corps, 1794-1815*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1), p.28.

<sup>8</sup> 例如，在羅馬兵團中，富有的公民擔任重步兵，次之的人充任輕步兵，再次之的往往僅能擔任僕役。非義大利人或戰俘一直要到後來才能進入兵團服役以換得公民身份。John Hackett, *The Profession of Arms* (London: Sidgwick & Jackson, 1983), pp.15, 21.

<sup>9</sup>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reprinted 1985), chapter 2.

<sup>10</sup> Robert O'Connell, *Of Arms and Men: A History of War, Weapons, and Aggres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46-47.

<sup>11</sup> 前者例如：當鐵器可以便宜地被製造出來，表示大量的男性均可以獲得武器與盔甲，即便是莊稼漢也能在戰場上有一定的威力，以貴族為主力的馬戰車 (chariot) 或重騎兵的軍隊結構，因之改變。見：William H. McNeill, *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 10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12. 而後者，當戰爭的政治目的逐漸脫離有限戰爭的概念後，戰爭型態也逐漸走向整體戰，參與戰爭的人口比例增加，以往對騎兵與步兵的區分，對於紳士與一般人的區分，不復存在。新興的輕騎兵取代以往昂貴、華麗的槍騎兵，甚至連騎兵不再是貴族的專利，也逐漸沒有以往貴族在盔甲、武器上的差異。羅伯斯 (Michael Roberts) 教授正確地指出：「在中世紀，戰爭是階級特權，而到了十七世紀，戰爭早已成為群眾的生活一部份。」見：Michael Roberts,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1560-1660," in Clifford J. Rogers edited,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Debate: Readings on the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ope* (Boulder: Westview, 1995), p.23.

僅基層士官兵出自平民，多數實際指揮軍隊執行作戰任務的軍官也多出自非貴族，縱使貴族出任軍官，亦非基於功能上的考量，而是象徵王室對戰爭的背書。<sup>12</sup>於此同時，工業革命的結果，在許多國家中（如英國）產生日益茁壯的中產階級與許多富人，這些富人取得相當的社會地位與政治權力後，也仿效起上流貴族的生活風格，使得擁有貴族般的地位認同和血緣出身間的等號也開始混淆。<sup>13</sup>

這些加總起來產生一項重要影響：就是哪些人具有軍官所需較高的榮譽與道德的認定，由「後天」、「組織內」的標準逐漸取代「先天」、「組織外」的標準：首先，軍官的任用標準逐漸以軍事組織所認定的專業能力取代血緣出身，而前者是可以經由後天訓練的；其次，以透過軍事教育系統培養而非以血緣出身認定其具有軍官的人格特質，前者也是後天養成的。誠如簡諾維茲教授所說的：

「在封建社會中，……軍事領導與權威來自於傳統、習俗與更重要的社會地位。封建時期的軍事建制具強烈的身世階級（ascriptive hierarchy）取向，身世意味一個人在軍中的地位是其社會特質而定，而非其個人成就。如果不是出生自軍官階級，將無緣成為軍官，只有少數人可以靠個人表現獲得晉升。當封建時期的軍事建制轉變成專業軍隊時，這些傳統上依賴身世取向作為軍中地位與領導基礎，被轉型為逐漸依賴個人成就作為標準。」<sup>14</sup>

然而，社會階級區分標準的改變，並不保證毫無標準或是社會階級的不存在。軍人，特別是軍官，仍然自認為並期待被認為具有較高的才能與道德，是國家社會的菁英階級。以十九世紀末期的英國皇家海軍為例，海軍官兵被認為不僅是海員與技術專家，而且也是「特別類型的人」，是「國家至高無上品質的表徵」。他們是「經過精挑細選出代表國家榮耀的人」，沒有人「能像海軍更能代表英國」，與「平頭百姓最大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是種族中優秀的典型。」<sup>15</sup>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軍官並無明顯的上層社會階級屬性，甚至於他們對於英軍中的貴族與雇傭兵抱持著敵視的態度。不過，在二十世紀初，美國「海軍主義」（navalism）抬頭，在馬漢（Mahan）的理論與在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時任海軍副部長）推動下，美國的國家繁榮願景建立在強大的海軍基礎上。海軍在自我認知與社會認知裡的地位大增，儘管海軍軍官大多只是來自中產階級，海軍成為美國軍隊裡最具傳統貴族軍官味。海軍成為「紳士俱樂部」，美國海軍軍官像是英國皇家海軍一般自詡具有上層階級的尊崇，是國家榮耀的表徵。<sup>16</sup>即便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蘇聯紅軍，他們作為一個無產階級社會下的特殊階級，其備受尊崇的原因部分

12 連此一象徵目的，到了二十世紀都日漸式微。英阿福克蘭戰爭時，英國王儲查理斯王子僅以直昇機飛行軍官參戰，並不擔任重要指揮職務。若是時光倒推二百年，查理斯王子當為英國特遣艦隊的指揮官。

13 G. Teitler, *The Genesis of the Professional Officers' Corps* (London: Sage, 1977), p.63.

14 Janowitz, *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p.60.

15 Ronald Spector, *At War at Sea: Sailors and Naval Comba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Penguin, 2001), pp.31-32.

16 C. W. Mills, *The Power Elit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reprinted 1959), p.181.

來自他們在戰時的貢獻，「他們誇大華麗的制服與金質肩章也處處顯示出他們以帝俄時期貴族軍官的傳人自居。」<sup>17</sup>

而為了維繫此一典型或階級，區分的標準縱使不再純以血緣出身考量，但仍有其他反映出當時社會狀態的標準。例如：一次大戰之前，只有那些能夠負擔海軍訓練艦或海軍軍官幹部學校學費的家庭，其子弟才有可能成為軍官。在當時的英國，只有百分之三的人有能力負擔此一費用，而其他百分之九十七的人根本毫無希望在海軍幹上軍官。一位美國歷史學家對當時的皇家海軍譏諷說：「這些軍官自認為是威爾遜的傳人，卻創造出一個如果威爾遜還在世根本無法獲得軍官任命的軍事系統。」<sup>18</sup>美國西點官校入學生要取得（21）國會議員的推薦信，雖然未必獨厚於上層階級，但上層階級的子弟具有優勢，是不爭的事實。不過，總的來說，二次大戰後，軍官團與上層貴族階級在身世血緣上的直接聯繫不復存在，<sup>19</sup>且區分的標準持續朝向後天的趨勢，先天的種族、膚色、性別都已經不再成為具有說服力的區分標準。而且，除了少數國家仍堅持宗教上或性傾向上的標準外，後天的標準也持續放寬。<sup>20</sup>哪些人具有軍官個人特質所需的榮譽與道德，不再是社會條件加強於軍事組織，而是軍事組織透過其內部篩選；不再有天生就具有軍官的人格特質，而是透過教育與升遷所構成的養成與社會化逐漸形塑。因此，以榮譽為核心的道德標準與軍人人格特質間的鍊結，逐漸脫離以個人的身份地位等相關因素的考量，而由軍事教育為核心的（但不是唯一的）塑造養成軍官人格的機制性因素所取代。

因此，軍事教育的目的除了在「在快速變遷的科技、社會與政治網絡中發展用以嚇阻、維持和平與戰鬥任務所需的軍事資源管理與運用」外，也旨在建立一些其他的特質以界定其專業，諸如共同的標準、團體的認同與特別的承諾。<sup>21</sup>特別是在軍官養成教育階段，榮譽感的培養是軍官學校的重要任務，<sup>22</sup>真正與戰鬥技能相關的兵科專業往往是官校教育之後的事。

而另一方面，就軍官對其工作的承諾的議題，實涉及軍官的工作究為一項職

<sup>17</sup> Brian Bond, *War and Society in Europe, 1870-1970* (London: Fontana Press, 1984), p.215.

<sup>18</sup> Spector, *At War at Sea*, p.35.

<sup>19</sup> Janowitz, *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p.xxvii

<sup>20</sup> 例如：同性戀者是否能夠服役的問題，是當前在後天區分標準上的一個重要爭執點。英國歷史學家畢佛（Antony Beevor）精闢地指出，此一議題「不在於同性戀者能不能成為好軍人，而在於他們對既有軍事系統產生的干擾程度。」而這當然包括對於既有軍事傳統認知與價值的差異程度。見：Antony Beevor, "The Army and Modern Society," in Hew Strachan edited, *The British Army: Manpower and Society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Frank Cass, 2000), p.69.

<sup>21</sup> Amos A. Jordan Jr., "Officer Education," in Roger W. Little edited, *Handbook of Military Institutions* (Beverly Hills, Sage, 1971), pp. 212-213.

<sup>22</sup> 以美國海軍官校為例，海軍官校生被培養出一種義務性的認知：保護其個人、海軍與國家的尊嚴是開展其成熟的軍官生涯不可或缺的。許多美國海軍將領都認為榮譽感的培養是官校生涯中極為重要的一部份。例如豪森（Henry L. Howison）少將說海軍官校生被一再提醒他們對其職務的忠誠宣誓「是不同於絕大多數人的」。他們被教育出強烈的個人榮譽感，認為這是作為無懼的領導人所需具備的特質。費斯克（Bradley Fiske）少將認為：「訓練一個人勇敢的最佳途徑：就是培養其自尊與受到同僚尊敬的渴望，讓他知道如果他行為怯弱，他就會失去這兩者。」麥卡拉（Bowman McCalla）少將回憶到當他還是官校生時，他被教成把「捍衛個人榮譽與海軍的榮譽」視為是海軍軍官不可或缺的特質。見：Peter Karsten, *The Naval Aristocracy: The Golden Age of Annapolis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American Nav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2), pp.30-31.

業、專業與志業的問題。<sup>23</sup>哈奇德爵士在其經典《軍事專業》(*The Profession of Arms*)一書中開宗明義地說：

「軍事專業的功能在接受命令使用武力解決某一社會問題。……遠古以前便有武裝人民以用來與他人爭鬥。但在某些時候、某些地點，加入軍隊——就其奉獻的觀點而言——是如同神職人員一般具有使命感。而此一觀點從未完全消失。軍人的工作一般(22)被認為是項專業(profession)，儘管有時也很惱人地被當作不過是項職業(occupation)。然而，軍人的服務卻一直呈現出作為一項志業的強烈特質(a strong element of the vocational)。」<sup>24</sup>

職業、專業與志業在概念上並不相同。莫可斯(Charles C. Moskos Jr.)教授對此有所區分，他認為：志業與價值有關，意味著將組織更高的目的置於個人利益之上，「志業通常能獲得社會較高的敬意，因為志業與自我犧牲和完全獻身於其角色有關。」同時，也具有幾項特色：(一)從事一項志業，儘管可能受有酬勞，但此項酬勞往往不是由市場價值能加以權衡；(二)從事志業的人認為他們與社會大眾有所不同，而社會也如此認為；(三)他們不會藉由組織自利性組織來訴怨。而專業與特定技能有關，通常指經過長期密集的學院訓練而獲得的技能。它的特色在於：(一)專業人士的酬勞依服務的開支與個別的技能；(二)專業人士通常以其專長為其終身職業；(三)他們藉由專業團體增進團體的利益。而職業與市場價值有關，它的特色在於：(一)酬勞係依照相當的才能，受雇者一方面可要求適當的薪資與工作環境，一方面受到契約義務對其工作負責；(二)個人的利益在任務或雇用的組織之上；(三)藉由工會來增進其利益。

而軍官的工作同時融合了志業、專業與職業三項特色。儘管軍事專業與其他民間專業(如律師或醫生)在標準上有些差距，<sup>25</sup>但軍官的工作具有相當程度的專業色彩應無疑義，而問題在於此一專業中志業與職業成分所佔的比例。<sup>26</sup>

當軍事專業中融合志業的成分愈高，其承諾愈深，其工作在自我認知與社會認知獲得尊敬的可能性越高。軍事專業中的志業成分顯現在其對所服務的國家社會所負有的「無限度義務」(unlimited liability)。<sup>27</sup>此一無限度義務拿國軍的慣用語就是「誓死達成任務」。當軍人將國家整體利益、軍事團隊利益置於其自身的利益之上時，不僅須為工作犧牲個人安逸自由的生活與家庭的美滿，在戰時甚至

<sup>23</sup> Charles C. Moskos Jr., "The Emergent Military: Calling, Profession, or Occupation?" in Franklin D. Margiotta edited, *The Changing World of the American Military* (Boulder: Westview, 1978), pp. 200-202.

<sup>24</sup> Hackett, *The Profession of Arms*, p.9

<sup>25</sup> 有關軍事專業與民間專業的異同甚具參考性的文章，如：C. J. Downes, "To Be or Not To Be a Profession: The Military Case," *Defense Analysis*, Vol.1, No.3 (1985); Gwyn Harries-Jenkins, "The Concept of Military Professionalism," *Defense Analysis*, Vol.6, No.2 (1990).

<sup>26</sup> 必須注意的是：儘管在西方的概念中一般認為軍官團是一具有軍事專業的團體。但不能排斥其他的可能性，例如在游擊戰或恐怖組織中的指揮員，就西方的標準是不具專業，或甚至不被認為軍人的。但是他們執行戰鬥任務(或依西方的解釋暴力活動)，具有高度志業成分。

<sup>27</sup> Hackett, *The Profession of Arms*, p.202

得付出個人的生命。這種連生命都可以為國家、團隊犧牲的使命感，是其他民間專業所無法相比的。而由於這種的無法相比，在相當程度上合理了其與社會不同、經過挑選（23）過的菁英等自我認知與社會認知。<sup>28</sup>如同神職人員將自己奉獻給上帝，軍官因將自己奉獻給國家而受到尊敬。

另一方面，當軍事專業融合職業的成分愈高，其回饋愈多，其工作在自己認知與社會認知上與其他民間職業的差異度越低，儘管可能獲得羨慕，但要獲得尊敬的可能性較低。軍事專業中的職業特色愈高，契約合同的概念越重，無限度義務的成分越低，軍事組織獲得社會尊敬的主要信念因之動搖。<sup>29</sup>同時，誠如莫可斯教授所指出，此時，工作者所比照、學習或仿效的參照團體（reference group）將會是軍事組織外的團體，而不是自己的長官同僚；工作者的家庭與配偶也不會與軍眷社群結合在一起；工作者的滿足是建立在酬勞的額度上，而非使命感的滿足上。<sup>30</sup>但是兩難的是，在非戰爭時期，通常需要軍事專業的職業化才能維持相當數量且穩定的軍官來源，而且在一個非極權的自由市場經濟國家中，由於軍隊在人才招募上往往必須與民間企業相競爭，軍隊往往以提高待遇、保證升遷或工作條件上的妥協等等措施來吸引或留住人才在軍中服務，軍事專業高度融入職業成分的傾向可能難以逆轉，但一旦職業成分的比重超過一臨界點後，有可能造成少數人「把『職業主義』放在專業的倫理道德之前，而且總是這些人在外頭搞得聲名狼藉，破壞了整體專業的聲譽。儘管軍事專業中若干特有與社會有別的特質依舊存在，但……卻是〔職業主義〕此一因素造成對大眾〔軍事專業〕的錯誤解讀與忽視。」<sup>31</sup>

總的來說，為什麼軍官必須要有較高的榮譽與道德標準，在歐陸係由貴族階級意識演進到由軍事組織內的內部教育養成，軍事教育的人格養成在培養出將志業成分融於軍事專業中，使軍官能擔負國家託付之無限度義務。而藉由此一志業獲得軍人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中值得尊敬的道德高地。然而，在現實面上，軍事專業需要相當的職業化，才足以維持有相當質量的軍官服務。不過，如果軍事專業過度地朝向職業化，軍官工作將無異於民間職業，此一道德高地亦將難以固守。（24）

### 三、榮譽的內涵為何

湯部長在六月十一日的談話中強調所謂「西點軍魂」繫乎於每一位西點軍人

<sup>28</sup> Christopher Dandeker, "On 'the Need to Be Different': Recent Trends in Military Culture," in Hew Strachan edited, *The British Army: Manpower and Society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Frank Cass, 2000), p.175.

<sup>29</sup> 因為可能形成兩項結果使然：（一）可能產生工會化（unionization）；（二）可能加深對由製作文職人員履行軍事任務的依賴。見：Moskos., "The Emergent Military," pp. 203, 205.

<sup>30</sup> Charles C. Moskos Jr., "Institutional/Occupational Trends in Armed Forces: An Update,"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Vol.12, No.3 (1986), p.378.

<sup>31</sup> Sam C. Sarkesian and Robert E. Connor Jr., *The US Military Profession into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War, Peace and Politics* (London: Frank Cass, 1999), p.29.

都能保有至高無上的「榮譽感」；對於國軍，「榮譽就是我們的家聲，我們絕不能做出有辱門風的事情，我們必須盡全力全力來維護軍譽」。分析湯部長的談話，可認為榮譽係與不同層次上的三者有關：在志業層次上，榮譽與理想不可分，國軍要鞏固以「追求理想與榮譽為核心的價值觀念」，「使軍人能以其志業為榮」。在專業層次上，榮譽與責任不可分，軍人榮譽建立在竭盡己力精進此一專業，「並願意為其專職的工作犧牲奉獻」，「唯有具備高度的責任心與榮譽感，才能確保軍人在最危險與最嚴峻的考驗下，仍然會做出最正確的抉擇。」最後，在最低的職業層次上，榮譽與守法不可分，要「依法行事、依法行政」，「只有遵循法律的規範」才是「榮譽的表徵」。

相較於湯部長的務實說法。西方對於軍官榮譽的具體內涵，卻深深受到歐陸浪漫的騎士精神所影響，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由傳統軍事組織內最主要的參照團體（長官與同僚）之集體心證加以具體評定。早期，歐陸軍官所稱的榮譽感包含在紳士或貴族等概念之下，如同前述，紳士或貴族都是先天與來自軍事組織外的標準下產物，只有他們才有社會與經濟上的資格成為騎士。德國歷史家法迦斯認為：榮譽與中世紀武士的騎士精神相關，是貴族引進以用來區別被他們認為低下的階級。他說：「榮譽，是企求與眾不同與較高的階級。建立在以貴族社會主要原則的道德基礎上。」<sup>32</sup>而這種榮譽很顯然是階級的集體榮譽，而非起於個別良知與心智的個人榮譽。兩者的差別在於集體的榮譽是排外性的，不同於內在性的個人榮譽。因為「榮譽是整個同儕團體的尊嚴」，集體的榮譽即使經由國王親授，往往也必須取得此一榮譽階級其他成員的默示同意。榮譽使得當時歐洲軍隊裡的貴族階級成為自我治理的團體，擺脫了社會乃至文人政府的控制。<sup>33</sup>

同時，紳士或貴族的舉止往往包含甚廣，榮譽的內容因之無所不包而且極為主觀。吐斯登（Thomas Truxtun）是美國海軍最早的六個上校（由於當時美國海軍並未設有將軍，上校是當時最高階的軍官）之一，一手創建美國早期海軍軍官團，他在一七九九年一封吐苦水的信中說：

「每天都痛苦地看到要把從商船船隊的一些凡夫俗子變成軍官的困難；一般而言，這樣的困難在於齊頭（25）式的教育以及這些人一開始時都沒有考量到為確保國家權益與尊嚴而身為戰艦軍官所需的相關榮譽與珍貴的信任。儘管時間可以慢慢矯正此一問題，不過我們還是得依賴那些有原則、受過良好教育、高度榮譽感、舉止端正、謹慎以及有相當社會地位的年輕人。這些人不會隨便聽從市井百姓的錯誤論調，而會學得正確的思維與言行。他們會把握機會習得所有專業知識，行為舉止卓然出眾，掌握至將軍以降各階級軍官所應有的特質，注意品德上的任何細節，渴望榮耀，行動敏捷，言談舉措考慮周詳，鄙視低俗與怯弱，認真進取，厭惡賭博與酗酒，人道地行使職權，警

<sup>32</sup> Alfred Vagts, *A History of Militarism: Civilian and Military* (New York: Greenwich, 1959), pp.66-67.

<sup>33</sup> Vagts, *A History of Militarism*, pp.68-70.

惕下屬執行命令，服從所有長官，遵從軍種的成規與禮儀，最後並能在任何場合留意與呈現作為軍官與紳士的真正特質。」<sup>34</sup>

吐斯登上校的痛苦，在於用如此幾近於完人的高標準條件，凡夫俗子當然很難變成軍官與紳士。

不過，儘管帶有階級意識，軍官等於「紳士」至少勾勒出西方早期軍官榮譽的輪廓。在美國海軍，「年輕的紳士」一詞用來稱呼海軍官校生與艦上實習軍官。<sup>35</sup>馬奇教授在其《紳士般備受尊崇的專業：美國海軍軍官團的建立，一七九四至一八一五年》（*A Gentlemanly and Honorable Profession: The Creation of the U.S. Naval Officer Corps, 1794-1815*）的巨著中，說「稱呼一位海軍軍官為紳士並不必然意味他出身自某一社會階級或擁有相當財富或具有特定教育程度。在眾多有關紳士的定義中，最符合海軍軍官在其心中所認定自己就是紳士（most approximates what the naval officer had in mind when he identified himself with the term）的定義是：非從事於卑賤工作或以體力勞動掙活的人，而以認為合於其尊貴地位的行為準則行事的人。……真正的軍官也就是紳士般的軍官，經過訓練與社會化以諸如『榮譽』般等行為準則行事的人。」<sup>36</sup>簡諾維茲教授認為：「紳士概念一直是軍事榮譽的核心部分。只要軍事菁英認為他們因為具有戰鬥精神而感到與眾不同，自認為紳士的概念是不可或缺的。」<sup>37</sup>這種「紳士舉止」包含了倫理的行為、內在化的紀律、避免放縱的惡習、與同僚間和諧的關係、有禮貌、個人用品與環境的整潔、文雅的個人嗜好以及培養與自己社會地位相當同輩的習慣或最好仿效那些社會地位比自己好的前輩。<sup>38</sup>

雖然簡諾維茲教授曾提出軍官榮譽（26）譽表現在四個面向上，這四個面向包括：（一）紳士舉止（gentlemanly conduct）、（二）個人忠誠（personal fealty）、（三）同志精神（brotherhood）以及（四）追求榮耀（the pursuit of glory）。<sup>39</sup>依他的詮釋，這四個面向大抵包括了被其他軍官所能接受的行為、對長官的效忠與服從、團隊精神以及追求成就。然而，簡諾維茲的講法很大部份仍然無法充實榮譽感的抽象內容。另外，佩爾頓教授則認為：榮譽是一種規範與儀式。更重要的，由於它被所有的國內或甚至國外同類菁英所公認，榮譽成為一種既定的一致性。<sup>40</sup>米爾斯教授則進一步說：「這種一致性適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是在一個包羅萬象的紀律系統下發展出來的。」而這包括一種處身於上流的感覺、有組織的生活型態、與同僚一致的言行舉止及思維模式、忠誠服從和順從自己在層級被安排好的身份並知道自己確切的位置而不越雷池半步。<sup>41</sup>由此觀之，即便軍隊內部有其

<sup>34</sup> 引自：McKee, *A Gentlemanly and Honorable Profession*, p.167.

<sup>35</sup> Karsten, *The Naval Aristocracy*, pp.24, 31.

<sup>36</sup> McKee, *A Gentlemanly and Honorable Profession*, p.34.

<sup>37</sup> Janowitz, *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p.220.

<sup>38</sup> McKee, *A Gentlemanly and Honorable Profession*, p.169.

<sup>39</sup> Janowitz, *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pp.218-225.

<sup>40</sup> Maurice Pearton, *The Knowledgeable State: Diplomacy, War and Technology since 1830* (London: Burnett, 1982), p.30.

<sup>41</sup> Mills, *The Power Elite*, pp.194-196.

典章規定對於軍官的榮譽內涵做出說明，至少在西方，軍官榮譽在很大程度上繫乎於軍官團的對其成員的認同上，在這種認同下軍官榮譽的內涵仍然是相當主觀而極富解釋彈性的。

#### 四、現代社會中變遷的軍事專業與軍人榮譽

在西方，社會對於傳統軍事專業乃至軍人價值系統的最大挑戰來自於安全威脅與社會的轉變。就前者來講，冷戰的結束對許多歐美國家軍隊產生深刻的衝擊，核戰乃至大規模戰爭可能性大為降低，對國家主權完整的威脅幾乎消失，軍隊的傳統角色與任務產生極大的變化，這些衝擊深刻地影響到軍人自我認知與社會認知下的軍事專業。<sup>42</sup>在這方面，儘管今日兩岸關係的結構性問題依舊存在，我國所面臨到的安全威脅並無改變。但整體情勢已較風雨飄搖的一九五、六〇年代要好上許多，兩岸交流頻繁，且無戰爭的立即性危險，因此，儘管國軍傳統的角色與任務上變化不大，但對於軍事專業而言，許多軍官自我認知與社會認知上的轉變悄然發生。就後者而言，如同西方社會所經歷過的轉型一般，在短短的半世紀內，就產業別來講，台灣社會經歷過農業社會、工商業社會到現代化服務業社會。社會的價值與年輕（27）一代的想法，都與以往大為不同。這是湯部長認為發生軍校生考試作弊的主要成因。湯部長指出：「時代社會價值的改變，以及社會多元化的發展，人們很容易受到外界的誘惑而迷失自我，這也是國軍軍事教育與管理工作所面臨的最大考驗。」湯部長認為：此一外在性社會因素對於軍隊的傳統專業認知與榮譽感可能帶來不利的影響，為了維持國軍聲譽與形象，大家「千萬不要被社會不良的風氣所影響。」

在變遷之中，軍隊如何與社會互動？以往軍事專業與軍人道德上許多有所不同於民間專業與社會價值的地方是否應持續保留？針對這些問題，基本上存在三種見解：第一種，就傳統的軍事專業主義來看，為保障有效能軍事組織，與社會保持距離是必要的。軍隊與社會之間的代溝顯示兩者之間存在因文化與價值的差異所顯現的本質上的不同。為免社會變遷影響軍事效能，此一距離必須保持。第二種，藉由設計出一個能反應其母體社會中文化與社會成分的軍隊以盡力弭平此一代溝，並避免軍隊成為一個孤立的體制與它所服務的社會隔離。第三種，只要軍隊接受對文人政府的服從並在不積極介入政治下瞭解軍隊在政治體系中的政治角色，此一代溝可以得到若干調和。<sup>43</sup>

此一議題的影響是深刻與全面的。就本文範圍舉出一例：在相對和平的環境中，軍事專業除了傳統的與作戰相關者之外，如何維持和平讓戰爭不致爆發或如何執行非作戰性任務等等逐漸加諸於軍事專業範圍之內。雖然傳統派的軍官不會歡迎這種轉變，他們還是堅持軍人的本業就是備戰作戰，即使軍隊有能力處理這

<sup>42</sup> Sam C. Sarkesian, John A. Williams, and Fred B. Bryant, *Soldiers, Socie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5), pp.151-152.

<sup>43</sup> Sarkesian and Connor, *The US Military Profession into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p.20.

些非傳統性作戰的任務，但基於專業分工與保留資源，軍隊還是不宜介入。<sup>44</sup>從一個務實的觀點，在一個相對和平的環境裡，社會評估軍隊的往往不是他們真正的傳統專業表現，而是一些被軍隊認為是邊陲的事。<sup>45</sup>而且從越來越多的軍隊介入國內救災到國際人道救援工作甚至於是美伊戰爭後由美軍負責伊拉克重建工作等等案例，認知中軍事專業範圍的擴大是個趨勢。在軍事專業的範圍擴大後，軍官被認知即使不是所謂的「學者般軍(28)人」(soldier-scholar)或「政治家般軍人」(soldier-statesman)，也應當具備相當的軍事以外知識，<sup>46</sup>以應付與傳統戰鬥技能無關的但卻成為議題焦點的任務。因此，軍事教育本身不能再限於僅與戰爭相關的對武裝暴力的使用與管理技能，而可能必須涉及不同學科領域的學問。儘管，有少數學者持不同意見，<sup>47</sup>但大部分學者認為：在現今社會「狹隘的技術訓練已不足培養出今日所需的軍官，最好的軍官需要走出專業軍事教育的正式體制之外，在民間最好的機構中受研究所以上的教育。」<sup>48</sup>誠如簡諾維茲教授在一九七〇年代時曾說：「經過兩個世紀後，美國軍官團已經轉型向技術專長的方向，既有的軍人榮譽儘管主要是附屬於身份與傳統的，仍必須技能與技術成就相互配合。同樣的，軍人榮譽必須回應社會全體在社會價值上的轉變。」<sup>49</sup>當二十一世紀，被認知中的軍事專業領域擴大之後，在西方軍官的榮譽感內涵也逐漸有所轉變：

(一) 所謂紳士般的舉止，被認為是維多利亞時期老掉牙的遺緒。傳統的儀俗被認為是不切時宜，避之如敝屣。<sup>50</sup>

(二) 階級（包括社會的與軍職的）的權威不是理所當然的，是靠掙來的。<sup>51</sup>為履行戰鬥任務所需的嚴格服從關係因此鬆動。命令權威的絕對性鬆動，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解釋、專業知識和集體共識等相對性基礎上。<sup>52</sup>

(三) 團隊精神的重新定義，一些像是英國陸軍具有相當兵團（regiment）認同基礎的軍隊，原有的團隊認同被認為會助長狹隘軍種利益而不利於達成聯合作戰、聯盟作戰、軍文合作等等超脫團隊的要求。<sup>53</sup> (29)

44 James F. McIsaac and Naomi Verdugo,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 Domestic Perspective," in Don M. Snider and Miranda A. Carlton-Carew edited, *U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risis or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CSIS, 1995), p.30.

45 Beevor, "The Army and Modern Society," p.66.

46 Christopher Dnadeker, "The United Kingdom: The Overstretched Military," in Charles C. Moskos Jr., John A. Williams, and David R. Segal edited, *The Postmodern Military: Armed Forc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36-37. 簡諾維茲教授亦認為：進入上層軍人的核心的軍官必須具有革新的視野、睿智的責任感與政治技巧等等，不再純以軍事技能為限。見：Janowitz, *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p.xxxiii.

47 例如：克蘭文德（Martin V. Crevelld）教授認為：多受些民間教育對於以作戰為核心的軍事專業並無幫助。見：Martin V. Crevelld, *The Training of Officers: From Military Professionalism to Irrelevanc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48 例如：John A. Williams, "The Postmodern Military Reconsidered," in Charles C. Moskos Jr., John A. Williams, and David R. Segal edited, *The Postmodern Military: Armed Forc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68.

49 Janowitz, *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p.217.

50 Beevor, "The Army and Modern Society," p.64.

51 Dandeker, "On 'the Need to Be Different'," p.181.

52 Janowitz, *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p.xix.

53 Dandeker, "On 'the Need to Be Different'," p.177.

（四）追求榮耀是以軍職為志業的成就滿足。但當職業成分增加後，追求的變成純為物質報酬的滿足，軍職成為僅僅一項職業，是個人職業生涯中的一個跳板。<sup>54</sup>

而且，誠如前述，在西方，榮譽是一種可被同儕軍官團成員所共同接受的行為準則，它對於傳統的依附性，有時會成為軍事革新的阻力，因為革新在本質上就是在推翻多數人所認為是約定俗成的慣例。當來福槍發行之後，部分英國軍官基於道德的理由反對引進，認為來福槍會使得步兵成為「長程的刺客」(long range assassins)。<sup>55</sup>同時，在西方，榮譽的解釋極富主觀與彈性，當某一行為發生在公私領域交錯的灰色地帶時，此一現象特別顯著。有些私領域的行為（個人榮譽部份）縱使無損於其軍事專業表現，因與團體共通標準不一致，依舊無法見容於團體榮譽之中。

值得一提的，這些衝擊對於軍事教育體系將較之軍隊整體為大。軍事教育體系，特別是基礎的軍官學校背負著維繫軍人道德傳統的責任，此一責任使得軍校在本質上即使不是全然復古守舊的，<sup>56</sup>但也比較容易拒絕隨社會價值做出因應。<sup>57</sup>而軍校卻處於軍官養成的第一線，直接面臨到年復一年新生所帶進的多元社會價值的衝擊。同時，一方面，軍事院校的目的在培育正確思考的未來軍官；另一方面，正由於其此項功能的成功，家長拼命把問題小孩往軍校送，把軍校當作社工，希望軍校能矯正其小孩。而後者，正蠶食軍事院校的資源與時間，反過來影響其前項的主要目的之遂行。<sup>58</sup>

在資訊時代的今日，軍隊要離群索居、完全隔離社會的影響是不可能的。對於今日軍隊的課題，與其窮思如何拒絕與社會接觸，倒不如主動地迎納那些有益的社會影響並堅定地拒絕會影響軍隊效能的負面社會因素。<sup>59</sup>在社會與安全環境變遷中，軍隊（30）與社會的關係誠如學者所指出的：

「以往大家認為一個有效的軍事體系是建立在軍事體制的自主性與其對國內社會議題保持一定的距離。〔現在〕軍隊與社會間的距離似乎大為縮短，引起了軍隊團結與效能上的問題。……關鍵性的議題在於軍隊應如何與社會的共通點上縮短與社會間的差距，同時還能保持

<sup>54</sup> Beevor, "The Army and Modern Society," p.64.

<sup>55</sup> Pearton, *The Knowledgeable State*, p.30.

<sup>56</sup> 「如果十九世紀的美國多少可被認為是正邁向民主的、沒有階級的、反建制的、個人主義的或和平主義的，那麼海軍官校顯然與此脫節。如果美國的西部拓荒者正在創造新的習俗，那麼美國海軍官校生正在重新學習舊的習俗。」見：Karsten, *The Naval Aristocracy*, p.33.

<sup>57</sup> 例如：西點軍校或海軍官校，對於演變比較欠缺意願與能力，軍校不認為需要採取一些像是選修課程等等的革新措施。誠如一位陸軍軍官在一九一七年所指出的，「西點軍校的魅力在於許多事務不會改變。」見：Stephen Ambrose, *Duty, Honor, Country: A History of West Poi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6, reprinted 1999), pp.191-193, 197, 203.

<sup>58</sup> McIsaac and Verdugo,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p.31.

<sup>59</sup> 對於後者，畢佛教授的四點在戰術面上的操作可說是有用的建議：一旦軍隊決定拒絕某些社會的影響時，要注意：（一）被動回應下的決定往往好不到那裡去，軍隊要有預見爭點的本事；（二）軍隊不必然要全般反映社會，但也不須起而阻擋社會風氣的演變；（三）單單以道德原則與指出軍隊有所不同是不足夠的；（四）拒絕的理由一定要僅出於作戰需要的理由，並僅以此為辯護。Beevor, "The Army and Modern Society," p.73.

自主性、團隊感、專業倫理與戰鬥效能。」<sup>60</sup>

當軍隊面臨到一系列對於他們獨特文化與價值系統的挑戰。軍隊需要發展出一套人事政策出來，一方面既不會損及軍事效能，或至少讓軍官不會覺得外頭那些不懂軍隊功能的人一天到晚對他們頤指氣使。同時，軍隊與社會間的相互支援的鍊結必須要予以鞏固，與社會接近不見得會削弱軍隊，而反而會增強軍隊。在一個健康的民主政體中，軍隊不會離開他們所要防衛的社會太遠。畢竟是社會資助軍隊並賦予軍隊正當性的，而且也是社會源源不斷供應軍隊人力，軍人最後畢竟還是要回到社會的。<sup>61</sup>對於在一個相對上較為傳統與保守的軍事體制在自由與多元的民主社會中運作，一個均衡的辦法或許是杭廷頓所講的：「軍事建制儘管不同於但卻不疏遠於它所服務的社會。」<sup>62</sup>

## 五、結語

本文在傳遞這樣的訊息：對軍官榮譽的瞭解，是建立在對軍事專業瞭解的基礎上。因為他們是軍官，所以他們的榮譽感與別人不同。而他們是什麼樣的軍官，顯示出他們在榮譽上的要求範圍。

在歐陸，貴族軍官體系與根深蒂固的階級觀念曾經引導出一種以身份取向為認同軍官榮譽感的基礎，儘管這種身份取向的標準大抵已經消失，轉而訴諸志業色彩，但在軍事專業職業化的需要下，原本就極富主觀與解（31）釋彈性的軍官榮譽內涵，其流動性越大。在面臨到社會與安全環境的變化後，西方軍事專業中軍官榮譽所強調之與眾不同的需要基礎，益加受到挑戰。

國軍的萌芽，不到百年。真正軍事專業的建立與制度化，甚至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事。因此，我國軍事專業的形成並沒有存在真正的歐洲式貴族軍官體系，也沒有很強的階級意識，以身份特質投射到具有較高的道德標準在我國是不具說服力的。這也是說，與其繼續強調一個看起來甚具非議性、且有歷史斷層與陸軍本位的黃埔精神外，對於軍人作為志業、理想的強調，將可能是未來維繫軍人道德標準高地的最重要基礎。湯部長在談話中對於軍人信念、任務特性的強調是正確的方向。同樣的，我國軍隊中作為務實型武裝公僕的色彩似乎也要比歐陸浪漫型騎士或紳士風格來得重，湯部長把「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歸於軍官榮譽一部的講法，對於那些自詡為紳士般有騎士精神的西方軍官或許會覺得畫蛇添足，不過這確是做為公僕的最低標準。

在當前變遷中的台灣社會裡，說國軍封閉是不公平的指控。在過去，我國軍在融合社會主流價值的努力上有令人激賞的表現。十年間，它由一支政黨軍隊完

<sup>60</sup> Sarkesian, Williams, and Bryant, *Soldiers, Socie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p.150.

<sup>61</sup> Dandeker, "On 'the Need to Be Different'," p.185.

<sup>62</sup>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in the 1970s," in Franklin D. Margiotta edited, *The Changing World of the American Military* (Boulder: Westview, 1978), p. 33.

成堪稱滿意的國家化，這種成就沒有幾個國家能在十年間辦得到。在男女平權的表現上，它可能是東亞民主國家中的典範。在軍中人權上，甚至被認為跑過頭了，影響了部隊正常訓練。而另一方面，就一個久未戰事的國家（意味著軍隊鮮有軍事勝利的經驗與機會）的標準，我國社會對於軍隊的支持程度之高，是令人驚喜的，這顯示出社會認知中對軍隊有極大的期許。因此，國軍並不疏遠於他們所服務的社會。

在開除五名陸官學生事件中，國軍堅定地劃下國軍在道德上與眾不同的榮譽標準。無論是認為他們考試舞弊行為或是表達訴求行為（但願都是）違反榮譽，違反軍官團所認同的一致性行為標準，從湯部長以志業、理想相繩來看，此一標準都是高標準。而社會的支持堅定地同意國軍所劃下的標準，而這也是說，堅定地要求這樣的標準也要適用到其他軍官上。在背書的同時，社會正要求國軍將其在軍事專業與軍人榮譽上的支票如數地兌現。(32)

陳文政

中興大學法律系、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畢業，現為英國蘭開斯特大學政治系國防與國際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並為中華民國國防政策與戰略研究學會執行長。

戶籍地址

台北市北投區奇岩里 1 鄰公館路 112 號 2 樓

身份證字號

F120520143